



ZHONGGUO
DEDIYIMU
XI'ANSHIBIANMIWEN

中国的第一幕
— 西安事变秘闻

【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著

牛玉林 译 卢匡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DEDIYIMU
XI'ANSHIBIANMIWEN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

【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著

牛玉林 译 卢 匡 校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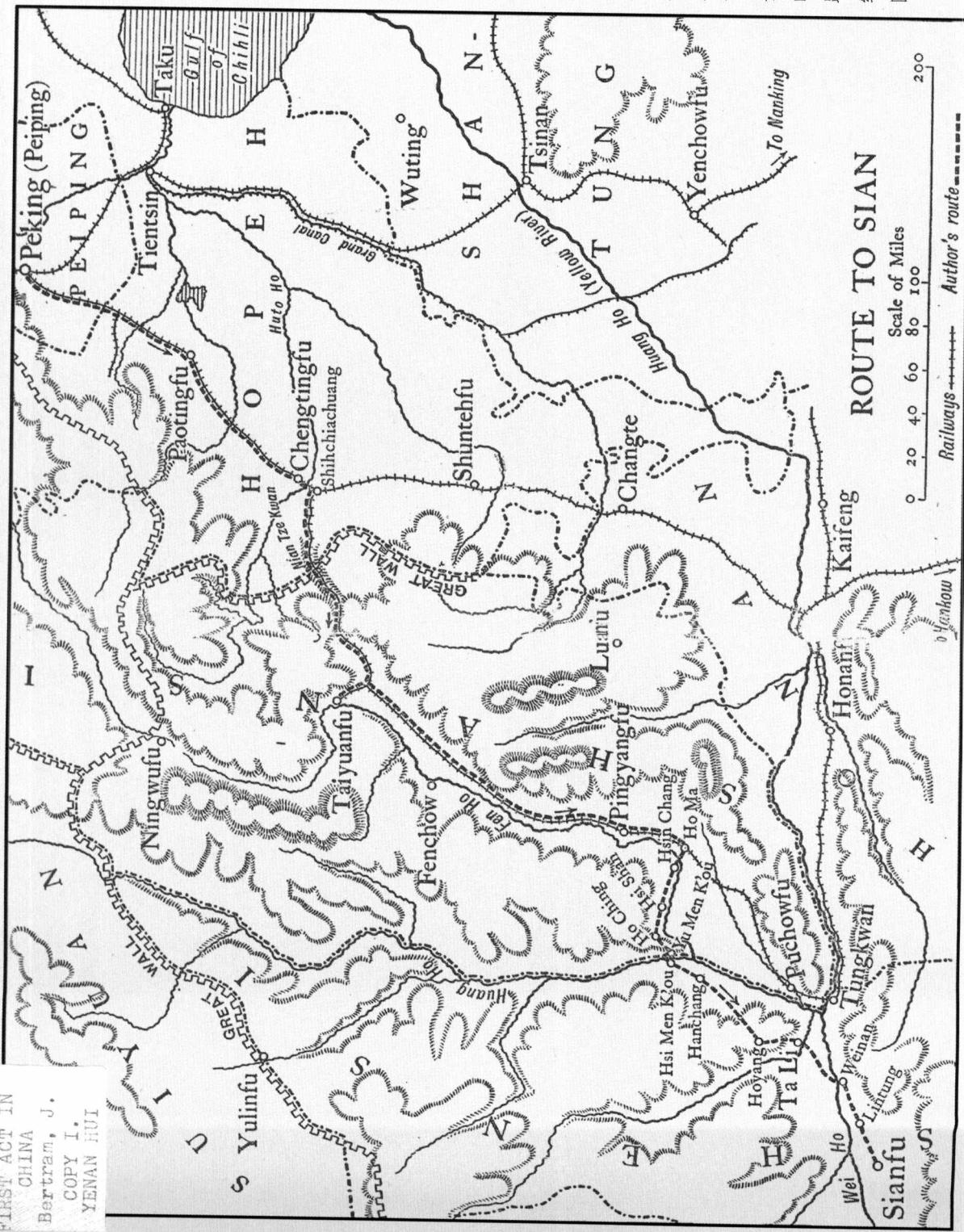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 (新西兰) 贝特兰著;
牛玉林译.—2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4-00715-2
I. 中… II. ①贝… ②牛… III. 西安事变 (1936) —史料
IV.K20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7838号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作 者: [新西兰]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译 者: 牛玉林
责任编辑: 张海潮 许晓光
美术编辑: 王晓勇
图文制作: 王 博
艺术总监: 王晓勇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20.25印张 14插页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2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0715-2
定 价: 32.00元

作者到西安的路线图



FIRST ACT IN
CHINA
Bertram, J.
COPY I.
YENAN HUI

向东北义勇军致敬



致中国读者

本书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年轻外国观察者，在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处于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为了捕捉当时那种紧张气氛和领略那令人激动万分的情景而作出的一个尝试。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现在回首往事，我依然认为，在中国为其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西安事变”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环节之一。在这次事变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蕴含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精心策划的某些战争和政策谋略在内。

1936年12月，我自荣获罗兹奖学金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在北平已度过了一年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我住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公寓里，与两位最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同居一室。当时，埃德加·斯诺和他那位总爱幻想的妻子尼姆·威尔士，已从海淀区搬到了古城墙角落的一座公馆，在“狐狸塔”附近。作为斯诺的朋友，我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那年夏天，当斯诺进行那次开拓性旅行，到西北采访红军领袖们时，从燕大召来给他当翻译的，就是我的同舍宿友黄华。我的另一位宿友，是位身材魁梧的东北人，他叫张兆麟，不久便被召到西安，为少帅张学良编一份报纸。

多亏有这么多的关系，所以在蒋介石被俘于西安这一令人震

惊的消息传来时，我比大多数人都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久，我获得机会，遇见了曾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苗剑秋，并与他一道，进行了那次经由陆路到陕西首府西安的艰难备尝的旅行。我的旅行身份，是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和我们一起同往的，还有美联社的麦克·费希尔（也就是书中被称为“唐”的那位）。但只有我和苗剑秋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因此，我成了突破严密封锁，到达这座叛乱城市的唯一外国旅人。

现在，要说我对西安事变的记述还有某些价值的话，那大概是因为，我的记述完全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用第一手材料写出来的。兵变的发生经过，我是直接听之于少帅的那三位忠心不贰的助手——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久，他们三个协助少帅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使其得以实施执行。在本书中，我把他们称为“西安的三个火枪手”。关于杨虎城和他那支陕西军队的情况，我是从王炳南和他那位德国妻子——王安娜那里听到的，进而又通过他们的那位热情似火、个性坚强的朋友——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得到了更深刻的直接个人印象。不久，艾格尼丝、王安娜和我都卷入了西安无线电台的外语广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打破新闻封锁的唯一途径。后来我们得知，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外国驻华使馆的密切关注，对当时国际政策的制定，也许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后来的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对有关细节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也都特别强调共产党派往西安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便如此，如果要我再次讲述这段经历的话，我还要说，在协助解决这次危机中，周恩来作为核心人物，是完全当

之无愧的。在西安舞台上的四个主要人物中，只有蒋介石和周恩来，在中国具有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而具有骑士般侠肝义胆的理想主义者少帅张学良和勇猛无畏的陕西战士杨虎城，则是主要的不幸者：俩人不仅都失去了他们的指挥权和军队，而且在那位至死不忘曾蒙受过其耻辱的委员长的无情报复下，一个被终生监禁，另一个在南京政府行将垮台之际合家被害。

1986年12月，为了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我和我的妻子应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之邀，访问了北京和西安。于盛夏之际离开新西兰，在冰封雪冻的华北古城度过了极度紧张的两周多时间，实在令人感到既兴奋，又突然。

许多老朋友业已过世，而一些新的面孔则唤起我对他们的追思之情。在机场，杨虎城的大儿子杨拯民看上去酷似他的爸爸。张学良的表弟，温文尔雅的张学文，穿了件皮领毛呢外套，又很像我那位不安份的旅扮——爱把自己装扮成资产者的苗剑秋。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还是我在西安回忆起来的面容。

身材开阔的陕西人王炳南已是满头银发，他曾是深受杨虎城和周恩来信任的联络人。王炳南的前妻、金发碧眼的王安娜（现在的安娜莉丝·马顿丝）那突出来的侧影，使我想起她与我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共同主持西安电台外语广播时的情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少说也有一千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上，有位身着长衫，留着几缕胡须的老先生，在用他那似曾相识的透彻双目凝视着我，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前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久。应德田早已故去，苗剑秋据说在日本，而眼下的这位就是“西安的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人。

重返古都西安，一切就像50年前一样，在晴朗的冬日里，

我们从蒋介石在华清池的寐处出发，缓缓登上位于山腰的那座冰雪覆盖的“兵谏亭”。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地方，地下掩埋的一支军队依然在庆贺那位完成了修筑万里长城的帝王的伟绩，而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安事变也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是不会被忘记的——我所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外国旁观者，一个激浪堤边的守望人，我有幸获得了这样一个涉足其中的机会，从而感到自己也是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詹姆斯·贝特兰

1988年10月12日于新西兰惠灵顿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现代史》一书所作序言，略有删节）

再 版 前 言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是由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唯一突破重重封锁，从北平赶赴西安进行了长时间调查专访的英国记者、新西兰青年学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于 1937 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自 1989 年 3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一直被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研究和客观评价西安事变的一部最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著作。由于该书出版后适逢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它对唤起西方民众了解中国艰难困苦的社会现状，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本书中，作者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采访，向世人全面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其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这次事变令“当今中国最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一对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走向和解”。“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前提”。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对西安事变发生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现状的客观记录，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份活档案，具有鲜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感谢已故的新西兰友人贝特兰先生，相信每位读完本书的朋友，都会对作者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公正、客观和对中国人民的浓情厚意，有所

感触的。

完成此书初版的翻译后，笔者改行当了记者，也想能够像贝特兰先生那样，用手中的笔更多记录当代历史变革中的人和事。但因种种原因，无甚大作为。此次再版，笔者重操旧业，将初版译得不够准确的地方，对照原著进行了一些校正。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张海潮、许晓光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从发稿到出版，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且无论版式还是出书质量，较初版均好了许多。在此，亦向他们表示感谢。

牛玉林

2007年11月22日

果曾想来带去的那件衣服不从出——她要重归祖国去示威，大
脚的红肿，想采花，倒立在真的痛苦，挺起她的衣裳只平凡。

序言

中国在危机中

1937年7月，世人将铭记在心。它标志着西班牙历时一年的一场生死之战的结束。这是一场人类自由力量和法西斯主义的公然侵略之间的战争，而法西斯主义者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现已成为压在欧洲人心头上的梦魇。在上月那令人窒息的最后几天里，战争突然公开化了，并且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在膨胀和蔓延。

与威胁到欧洲那脆弱和平的同样一股肆意妄为的侵略势力，在另一个半球被释放了出来。远东开始爆发战争。

欧洲的困境历来是日本人的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其欧洲盟友再次紧密配合，趁西班牙战乱，不失时机地向中国那活生生的躯体扑了上去。随着最近的这次无端进攻，日本参谋总部的统治东亚，以及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计划，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而更接近于完成。

面对最近的这次挑衅，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尽管她孤零零地处在一个似乎只有反对和平的敌人能够成功联合的世界上，但她还是聚集起了本国所有的零散部队，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和美国——能够坐视远东当前的事态发展而无动于衷。

日本所要求的，决不仅仅是彻底征服中国。即使那些在远东拥有根本利益的西方列强——比之于他们在中国所能够得到的资本输出，或他们可能希望的，在一切市场上防范日本的竞争，他们的战略利益远为重

大，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也从不曾正视这种结局会带来的结果。

几乎只有苏联人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真正危险，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受到威胁的却并非只有苏联。大英帝国的东方前线，从悉尼一直到香港，如同现今已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威胁的地中海航线之现状所证实的，同样经不起日本的恫吓。而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西印度群岛，则对为配合其军事上的“大陆政策”^①而南征的日本海军敞开了门户。至于美国，无论其多么崇信“孤立主义”的利己政策，也无法逃脱他在西太平洋应负的责任。他在太平洋的生命线（借用日本人喜爱的一句话）是：追逐在中国快艇之后的尾迹。

今天，日本的眼前目标可能是华北，明天就是华南、香港和菲律宾。任何希望都比这种可怜的希望好，这就是通过不断的妥协让步来贿赂侵略者（英国外交界所死抱住不放的就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无所作为立场）。西班牙是在阿比尼西亚^②采用这一政策结出的恶果，而阿比尼西亚则同样也是在满洲施行这一政策的遗患。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人们不得不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弄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的远东事态再度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警惕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危险。对中国独立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太平洋有关的国家的挑战。不仅如此，它作为法西斯主义侵略攻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

中国并非仅仅在为自己而战——虽然她的战斗也是为了维护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一个民族的独立。无论是从她所卷入的这场斗争的本质上分析，还是从其对手的特点上看，中国都是站在反对无端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和平阵营前线。

如果中国不得不孤军作战，她也能够这么打下去，虽然那些对其沿海地区防卫力量之薄弱有所了解的人，对于她要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感到

惶恐不安。但至少（我们从她目前所处的困境中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抗击侵略者，保卫领土方面，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日本的侵略促成了中国内部争斗和剿杀都未能办到的事，使这个幅员辽阔而又陷于无组织状态的国家，溶化成一个理智的整体，这就是国难当头全体国民组织上的统一。

本书所涉及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往事——中国在向民族团结方面艰难迈进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最新和最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一事件是远东现代史上的一个决不可少的环节，唯有了解这一事件，才能够弄明白中国对日本最新挑战所做出的反应。此外，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国家，本书所涉及的事件尚鲜为人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在中国西部陕西省的一个冰封雪冻的山腰间，蒋介石将军为起来造反的“少帅”张学良的部队所俘获。这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头号政治事件，一下子使中国进入了世界舆论中心，从而使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一直持续到次年七月的中日战争爆发。

但这位将军并未被立即处死，尽管当时有人唯恐（也有人希望）出现这种结局。即使在欧洲，即使是已逐渐习惯了“晨报”带来耸人听闻消息的欧洲人，仅只看关于它的报道，便会觉得凶多吉少。在远东，人们的初步反应是一片惊骇。由此而引起的轰动，比之于前十个月在东京发生的那场军事政变^③，以及在政变中死去的著名人物所引起的轰动来说，它来势更猛，更使人为之震惊。日本国有其独特的暴力和政治谋杀传统，且崇尚剖腹自杀，这几乎成了年轻爱国者的神圣使命。一般而言，中国人在这类事情上的做法就不那么残忍。

此外，对于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人们忽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近来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很容易为一种假相所迷惑，这就是要把某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或者由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一下子被大多数人毫不费力地记起来），蒋介石的名字已经树立起来，流传于国外，他即使不代表中国，也至少是南京政府的象征。他的命运——几乎可以这么认为——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命运。

然而这一次，持有这种流行观点却不能算是什么错误。这位“委员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亦即“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国家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正如蒋夫人用一种可以原谅的夸张口吻描述的那样：西安，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看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棺材”^④。

在西安，通过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态转化——这种转化逃不过史学家的双眼，中国的“英雄”一下子成了中国的“小捣蛋鬼”张学良的阶下囚。在西方人的眼里，张学良一直被看成是个不负责任的鸦片鬼，他曾是公众谈论很多的人物。满洲失陷后，他一度非常体面地销声匿迹了，世道的冷酷使他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但随着西安兵变的发动，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这次委员长为其富有浪漫色彩的部属“绑架”，具有国际上这类戏剧性事件的所有成分。假如要想象一下同类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会引起的轰动，你可以设想如果墨索里尼被利比亚总督扣留在某个沙漠旅馆，或“第三帝国”元首于6月30号的国庆日为格林将军诱禁于他的猎屋中，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在这个令人茫然无措的12月，全世界意识到了中国的存在，并为其前景担忧。传出来的消息几乎完全缺乏真实性，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兵变的局势异同寻常，它的后果更难预料。“专家们”闭门苦苦思索，报纸发挥了超常的想像力，编造出许多自相矛盾的评论。诚实的

编辑们则把这一切说成是“又一道中国难题”。到此为止，不复深究。

但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圣诞节那天，“少帅”以一种堪与古代英雄相媲美的认错姿态（也可能是真的认错），驾着他的私人飞机，把他的“俘虏”送回到洛阳。稍后不久，他便出现在南京，“请求惩罚”。至于蒋介石本人，除了受了点惊吓和背部受了点轻伤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被完好无损地送交给谢天谢地的国家。中国的又一次危机结束了。

本书旨在描述12月那场危机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向读者揭示这一事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我想，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不管人们对他的做法怎样考虑，“张学良终归还是正确的”。而且我还相信，在本书的若干章节里，一个新的、更符合他本人的那种受到严重歪曲、诋毁的形象将首次出现。

但这只是附带提出来的，并非本书的全部宗旨。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来说，为一个人恢复名誉，这是件危险的事。更何况还是在远东，在亚洲这个社会激荡风起云涌的地方，这种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所激起的群众运动，较之为某个人恢复名誉，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所以我在本书中所乐于选定的主题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迫在眉睫的挑衅，中国的民族意识在增长，民族决心在高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崛起——尽管我知道自己无力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是遥远的，含混的，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生动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他们平时政治观念的淡漠和遥远，才容易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他们偶尔萌发出来的生动表现。大多数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完全用好莱坞制片商的眼光看待中国——一个对于构思电影脚本素材异常丰富的世界。

面对这个国家那神秘的背景和无数的芸芸众生，像这种确实引人注